

1920年代後期的蘇蒙關係

——以「雷斯庫洛夫事件」為中心

● 谷繼坤

摘要：本文依據俄國解密檔案，通過考辨「雷斯庫洛夫事件」的由來與真相，闡明1920年代後期共產國際對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策略及其影響，指出蒙古人民革命黨早期領導人強烈的本土自主性意識是事件發生的根本驅動力量。以1925年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決定驅離共產國際駐蒙古全權代表雷斯庫洛夫(Тураp P. Рыскулов)為契機，蘇聯對外蒙古進行了深度政治干預，通過中斷聯繫、扶持黨內反對派等手段，實現了對蒙黨中央的改組。共產國際藉此在蒙黨中央確立了佔優勢地位的政治影響力，蒙古人民革命黨則成為了貫徹蘇聯對外蒙古既定政策方針的忠實執行者。

關鍵詞：共產國際 「雷斯庫洛夫事件」 蒙古人民革命黨 「農村派」 蘇蒙關係

長期以來，學術界關於外蒙古^①問題的研究集中於1911、1921、1945年外蒙古自中國分離的三次「獨立」過程，而忽視了蘇聯對外蒙古的內部改造問題。蘇聯時期的學者多從意識形態的立場出發，認為蘇聯對外蒙古的「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給予了極大支持^②。二十世紀50至80年代的外蒙古學術研究，整體處在蘇聯史學學說的影響之下，帶有嚴格的意識形態色彩，積極宣導蘇蒙友誼，而對蘇蒙關係的消極方面和共產國際在外蒙古活動的負面作用隻字不提^③。中國學界的關注點多集中於外蒙古獨立問題，材料上多使用民國時期外交檔案資料^④，觀點上多從蘇聯推動世界革命、以國家利益為上等方面立論^⑤。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中國周邊國家對華關係檔案收集及歷史研究」(15@ZH009)第三期子課題「蘇聯對外蒙古內部改造研究(1921-1949)」的階段性成果。感謝匿名評審專家提出的修改意見，筆者自負文責。

本文即以近年來筆者收集的俄國檔案為核心，討論共產國際和蒙古人民革命黨（1925年前稱蒙古人民黨）圍繞「雷斯庫洛夫事件」的鬥爭博弈問題。本研究可以為更深刻地理解外蒙古何以在1921年之後同中國漸行漸遠並最終在1945年獨立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即蘇聯對外蒙古內部改造的視角——正是得益於1920年代對外蒙古的政治改造，蘇聯才能夠將自身的諸如「集體化」等發展模式套用於外蒙古，並最終將外蒙古改造成為其「衛星國」。從此角度看，1945年外蒙古的徹底獨立只不過是蘇聯長期以來對外蒙古政策的應有之義。

一 緣起：「雷斯庫洛夫事件」

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俄將外蒙古視為打破自身孤立地位、捍衛遠東安全，以及在東方國家推動世界革命的關鍵一環。為此，1918至1921年間，蘇俄將其擴張性的意識形態目標和尋求國家利益的主張結合在一起，成功實施了對外蒙古的「三位一體」戰略：1921年2月俄國內戰期間，恩琴（Роман Ф. Унгерн-Штернберг）率領白衛軍進入外蒙古，抵消了中國在外蒙古的軍事實力，蘇俄紅軍進而以消滅恩琴白衛軍為契機入蒙；在扶持蒙古人民黨掌握政權的同時將自身影響力滲入外蒙古；通過保持在外蒙古的軍事存在促使中國方面與其談判，進而打開同中國關係正常化的局面^⑥。在此過程中，共產國際扮演了重要角色。

1920年初，共產國際在伊爾庫茨克成立了蒙古西藏處，專門應對外蒙古事務。隨着北洋軍閥徐樹錚強力撤銷外蒙古自治，共產國際即以蒙古西藏處為依託，加緊了對外蒙古地區的地下革命鼓動和暗中支援工作。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當時在外蒙古進行革命活動的喬巴山（Хорлогийн Чойбалсан）和蘇赫巴托（Дамдин Сухэ-Батор）各自領導的革命小組合併成立了統一的革命組織——蒙古人民黨，並在1920年8月派遣「七人代表團」訪蘇求援，獲共產國際接待。最終，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援助下，蒙古人民黨在買賣城西部組建了游擊隊，並在1921年3月中旬改編成蒙古人民軍。6月16日，蘇俄紅軍出兵外蒙古，在外蒙古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有力抵抗。7月6日，蘇俄紅軍和蒙古人民軍的先頭部隊進入庫倫，蒙古人民黨奪取了外蒙古政權^⑦。

共產國際在幫助蒙古人民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事實上確立了同蒙古人民黨之間「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但雙方關係並非親密無間，而是一開始即存在分歧和矛盾。1921年3月18日，蒙古人民軍在蘇俄支援下攻佔了中國軍隊在外蒙古最後的軍事據點——買賣城，不料城內突然發生大火，於是蒙古人民黨決定將買賣城內的大量商品運往遠東共和國（蘇俄在遠東地區建立的緩衝國）境內的特羅伊茨科薩夫斯克出售，以換取必要的物資。在商品運出買賣城時，蘇俄對外貿易部門派駐的代表已經收取了關稅，然而當這些商品運至特羅伊茨科薩夫斯克時，遠東共和國海關機構再次要求支付關稅。這引起了蒙古人民黨人的極大不滿。遠東共和國不僅對他們的不滿不予回應，反而將商品倉庫查封並且派遣軍事人員看管倉庫^⑧。